

文化随笔

乐器史上的胡笳

胡杨

胡笳是边棱气鸣乐器，民间又称潮尔、冒顿潮尔。该乐器目前流行于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阿勒泰地区。

胡笳可用于独奏、器乐合奏或乐队伴奏，是富有浓郁民族色彩的吹奏乐器。

木制三孔胡笳，流传于蒙古族民间，深受普通牧民喜爱。

1985年，有关学者在新疆阿勒泰地区阿勒泰地区阿勒泰自治州发现了这种胡笳，将其定名为“阿勒泰胡笳”。管身木制，管长58.5厘米，管径1.8厘米，下部开有三个圆形按音孔，上端管口不设簧片。

演奏时，管身竖置，双手持管，两手食指、中指分别按放三个音孔。上端管口贴近下唇，吹气发声。可发出十二度的五声音阶。多运用喉音吹奏，常用喉音与管音结合同时发出声音，或用喉音引出管音。发音柔和、浑厚，音色圆润、深沉。演奏技巧独特，擅长吹奏蒙古族长调乐曲。

可用于独奏、器乐合奏或乐队伴奏，是富有浓郁民族色彩的吹奏乐器。

《太平御览》(卷五八一)载：“笳者，胡人卷芦叶吹之以作乐也，故谓曰胡笳。”《乐府诗集》中亦有：“卷芦为吹笳。”西晋傅玄《笳赋·序》中则有：“笳，苇之未秀者。”“苇，大葭也。”晋代郭璞说：“葭、芦、苇三字指的是同一种植物。原始的胡笳，曾用于战争之中。西汉之时已广泛流行于塞北和西域一带。”

随着社会的发展，历史上又出现了多种形制的胡笳。首先由芦叶的管身改为芦苇秆的管身，外形与维吾尔族双簧单管气鸣乐器巴拉曼(又称皮皮)相似，将芦管上端压扁后呈双簧形，管身与簧片仍为一体，所不同的是管身上没有开按音孔。嗣后，出现了簧片与管身分开的胡笳，仍然都使用芦苇管制作，簧片用坏了可随时更换，而无须更换管身。

汉代有两种胡笳。一种是管身和簧分开，芦苇制(也有木制管身)、管上开有三孔的胡笳，流行于广阔的蒙古民族地区。另一种是张穹通西域后传入的木制管身、三孔、芦为簧的胡笳，流行于广大的中原汉族地区，这种胡笳南北朝以后，逐渐被七孔笙箫所替代。

到了唐代，盛行以羊骨或羊角为管、管身无孔的哀笳，管身比胡笳较短。这种哀笳用于卤簿鼓吹乐，流行于塞北及河西走廊一带，一直流传到宋代以后。关于哀笳，唐代许多文人留下了不朽的诗句。王维曾在凉州作过节度使，他在《双黄鹂歌送别》中写道：“悲笳嘹唳垂舞衣，宴歌散兮复相依。”杜牧在《边上闻笳三首》中有：“何处吹笳薄暮天，塞垣高鸟没狼烟。”

清代，宫廷提倡“四方乐”，曾从新疆阿勒泰地区抽调蒙古乌梁海部到科尔沁草原，组成蒙古喀喇沁王府乐队，这就是清朝宫廷的“蒙古吹笛部”。使用的胡笳，《皇朝礼器图式》载其形制为：“木管三孔，两端加角，未耒而上，口哆(张口)。”《清史稿》中也有：“胡笳木管，三孔，长二尺四寸的记载。这种胡笳，管身下部开有三个等距圆形按音孔，并模仿哀笳形制两端置角，形如细而长的喇叭，管口上端施角，改双簧为边棱吹奏，管口下端接有向上弯曲的角制喇叭口，用以扩大音量。它一直在内蒙古各地王府乐队中使用。最后取消了两端的羊角，成为今日的胡笳。”

文化沙龙

长风引诗，魂铸凉州

——探寻徐兆宝《诗思入凉州》的精神维度与美学价值

马雯

海德格尔曾言“诗是存在的真理的创建”，徐兆宝以《诗思入凉州》构建着凉州大地的独特真理，将这片土地的灵魂以诗性语言呈现。扎根西部雄浑土壤，以凉州深厚历史文化为创作原点，让诗歌成为联结自然、历史与心灵的纽带。这部诗集如奔腾的羊河，既流淌着对故乡的炽热眷恋，又蕴含着对生命、历史与文化的深刻思索，铺展出血肉丰满的诗意凉州画卷。

徐兆宝以诗性笔触礼赞故乡与自然，尼采“只有在艺术之中，我们才能够避开成为它的牺牲品”的论断，在其诗中得到了印证。他避开直白宣泄，将情感藏于意象深处：祁连山“雪水凝固的地方/神祇在飞翔”(《守望祁连山》)，草原“灵魂与狂风，在草原尽头大张旗鼓”(《草原之夜》)，神性写作让自然成为信仰与乡愁的载体。

同时，他执着打捞历史“余温”。黑格尔“历史是一堆灰烬，但灰烬深处有余温”的哲思，化作“锈迹斑斑的兵刃”藏着的古战场硝烟，“孤独守望的城墩”回荡的王朝驼铃，挖掘出凉州深厚的军事文化底蕴。对生命意义的追寻同样动人，《飞过天空的鸟》中，鸽子抖落的金羽，响彻寰宇的鸣叫，将生命自由与存在觉醒书写得淋漓尽致，“鸟是仰望者心中的意识”更让飞翔成为唤醒生命的象征。稍显遗憾的是，诗集对凉州民俗风情着墨不多，若能深入饮食、婚丧等生活肌理，创作维度将更丰富。

徐兆宝的意象系统灵动深邃。“祁连山与雪”构成神圣符号，“白雪喂养在神的家里”(《祁连山的雪》)既象征纯净永恒，又凝结文化之根；“风沙与遗迹”充满历史沧桑，黑山石刻的灵性牛羊，过滩河边的沉默城墩，让时光冲刷的质感扑面而来。

语言风格兼具质朴与优美。《村庄》以“油菜花里老人的村庄”白描乡土，《祁连山上的姑娘》用“炊烟如青稞酒”尽显诗意。诗集结构精巧，七辑从自然到历史层层递进，“雪”“鸟”等意象贯穿始终，形成和谐的心灵交响。

诗歌承载着祁连山脚下的多元文化。对自然的敬畏体现在“白雪覆盖千年”的永恒与“马儿追赶百花”的生机中；宗教文化通过“手持佛珠的老阿妈”“转经筒里的庄稼安康”(《守望祁连山》)，将信仰与生活紧密相连；历史记忆藏在“遗忘的哈达”“河床上的歌声”中，诉说岁月传承。

更可贵的是，诗人展现了西部人民的坚韧。“鹰的翅膀承载仰望”“豹子为谁开花”的追问，让生命力量与文化坚守跃然纸上，“燃烧的火焰若蓝色的爱情”更颂扬了对美好生活的执着追求。

徐兆宝的诗歌在西部诗坛独树一帜。他笔下的祁连雪景、大漠苍茫，不仅是风光再现，更是精神象征；《初冬》中寻找方向的鸟雀、寒夜里的炊烟，充满人文温度。

在文化表达上，他将丝路遗迹等元素诗性转化，又创新性融合古典边塞气韵与现代意识，形成独特“新边塞”诗风。这种扎根地域又观照当下的实践，为后来者提供了宝贵镜鉴。

诗集构建“天地人神”四维审美空间，“雪线以上阳光灿烂/雪线以下人丁兴旺”实现神圣与人间的和谐共生。对文明的书写兼具本雅明“灵光”特质，牧场上的牦牛、蓝白经幡，将文化记忆升华为“诗的栖居”。

语言节奏独具匠心，“马儿追赶百花”的短句与绵长意象结合，形成马蹄般的韵律美。历史书写以“陶罐裂纹”式微物叙事，让一块石刻、一件兵刃成为时间的全息投影。“遗忘的光芒”对生命修复的隐喻，更照见现代人在破碎中重建完整的生存智慧。

当长风再次掠过祁连雪峰，掠过凉州大地的沟壑与城郭，徐兆宝的诗句便如石羊河的流水般，在时光的河床里持续激荡。《诗思入凉州》的价值，从来不止于对一片土地的诗意描摹，更在于诗人以赤子之心为凉州铸魂——那魂，是祁连雪的纯净、大漠风的苍劲，是古战场的铁血、转经筒的慈悲，是庄稼人掌纹里的岁月、非遗老艺人喉间的沧桑。

文化感悟

“白马”笔

胡晓玲

父亲擅长楷书和行书，草书也写得不错。我则喜欢隶书。

中国的文字，经历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以及后来的楷、行、草等书体的演变过程，而隶书是古今文字的分水岭。为了书写便捷，古人将篆书笔画化曲为直，书写变得率意，这一过程被称为“隶变”。随后隶书出现了两大体系，其一是规范、端严的隶书，多为石刻，至东汉已臻成熟，多用于庄重场合，著名的隶书碑刻有《礼器碑》《曹全碑》《张迁碑》等；自然书写，率意恣肆的简牍帛书，广泛运用于日常文书交流。隶书的书写性，正是体现在战国至秦汉时期的简牍帛书。如果将前种隶书称为“庄严体”，那么，后一种隶书则为“自由体”。当然，这种“自由”并非随意，而是有其约定俗成的书写规则。中国最早的毛笔书法：侯马盟书于春秋晚期的实物。盟书辞文，是晋国人用毛笔手书的文字真迹。盟书文字，字形古雅，运笔流畅，书法章法自然。盟书辞文在书写过程中强烈显示出柔软毛笔特有的弹性韵律，行笔轻重有度，具潇洒劲秀之风格，又不失古朴典雅。

书法艺术，博大精深。每种书体各有其风骨妍态，这就扩大了书法的表现幅度，为毛笔的驰骋开辟了更广阔的天地。它把线条所能显示出来的动态美感和意念境界挥洒到极致。汉字书法的无穷魅力，首先来自汉字独特的形体结构，决定性因素还在于书写者的文化修养、精神气质和表现技巧。而毛笔的发明，是我们祖先对文化事业的一大贡献，没有毛笔便没有汉字书法艺术，二者相辅相成，彼此倾注了无限生命力。

父亲的笔筒里有：“大狼毫”“小狼毫”“小羊毫”“兔毫”“鼯毫”等。父亲喜欢用“大狼毫”写大字，用“小狼毫”写小字，写对联多用“中狼毫”。父亲手握“狼毫”挥洒自如，写出的字俊秀飘逸。父亲最不喜欢的是“羊毫”。“羊毫”软、散、刺毛多，写出的字丑，无筋骨，会把写字人的心情带坏。写小楷字，最宜用“兔毫”，写出的字细腻、清秀。

我们从历史书中得知毛笔的发明者是秦朝蒙恬，证据表明：蒙恬的贡献更多的是体现在工艺改良或推行上。毛笔最早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彩陶上的纹饰充分表明，毛笔的雏形可能已用于绘制图案，从火烧沟出土的人形彩陶，黑色网格上衣，大约就是用毛笔画出来的。但尚无考证实据。商朝，甲骨文中“聿”(笔的古字)的出现及部分甲骨文先书后刻的痕迹，甲骨文上所刻的文字，都是经过毛笔书丹，然后再刻写，表明毛笔已开始使用。春秋战国时期，毛笔已广泛用于书写，“侯马盟书”是晋国人用毛笔手

书的文字真迹。

现出土的最早毛笔实物为战国时期的楚墓中，这支毛笔的笔管由竹子制作，髹以漆汁，笔头则是麻丝包裹兔毛而成。汉代兔毫普及，魏晋时期引入鸡毛、鹿毛等其他材料。

在甘肃博物馆中有一国宝级的毛笔，它是1959年，在武威唐磨嘴子汉墓中出土一支毛笔，笔上落款为“白马作”。这支毛笔是迄今为止我国所有出土汉笔中保存最完整、制作最精良、最早刻有笔工姓名而闻名于国内外的唯一一支，专家公认其为我国汉代毛笔的代表作。这支“白马作”毛笔，笔头长1.6厘米，嵌笔头处略有收分，笔头外覆黄褐色软毛，笔芯及笔锋用较硬的紫黑色毛，刚柔相济，富有弹性，体现了笔头中含长毫，有芯有锋，外背短毛，便于蓄墨。体现了优质毛笔“尖、齐、圆、健”的四个特点，适宜在竹、木质简牍上书写。长23.5厘米，正好是汉制长度单位的一尺，与王充《论衡》所言“一尺之笔”的长度吻合。杆长21.9厘米，中空竹质，浅褐色，精细均匀。笔杆中下部阴刻隶书“白马作”三字，刀法工秀整齐。《礼记·月令》里记载，“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勒名的方式主要有戳印、书写、刻画等几种，“白马”当为制作这支毛笔的工匠名。

所谓的“物勒工名”即为了确保产品质量，便于日后出现问题时溯源追责，统治者会要求在产品表面留下制作者的相关信息。如制作时间，制作者姓名等，与今日产品包装上的生产信息类似，日后若出现质量问题，方便查到责任人，依律加以处罚。秦朝实现了国家统一，“物勒工名”制度以法定的形式强化下来。汉承秦制，“物勒工名”的制度日臻完善，这一制度已深入官营手工业的各个方面。看来古人早已具有很强的品牌意识。

“白马笔”制作精良，保存1600多年没有朽坏。由此可见，汉代时河西走廊列四郡，据两关，民富而府库实，经济文化在当时高度繁荣的景象。

父亲写字，我侍候笔墨。他左手拿烟，右手写字，我按着纸，看他写完一个字，向上挪一格。有时，父亲写得忘了，把毛笔夹到耳朵上，无意间让人想起“簪白笔”的典故来。

《史记·滑稽列传》载：“西门豹簪笔簪折。”汉代官员们常将未蘸过墨，或用后洗净的毛笔尾端，插在头上以备记事，俗称“簪白笔”。《正义》曰：“簪笔，谓以毛笔装头，长五寸，插在冠前，谓之笔，言插笔备礼也。”《正义》所言：已经不是实用之笔，而纯为一种装饰物了。在武威出土的这支毛笔，笔之尾端削尖，很显然不是为了簪插，毛笔在墓主人头部左侧，表明人



险时笔即簪头上，证实了汉代文职官员常将未蘸过墨，或用后洗净的毛笔尾端，横插入发中或冠上，以便随时取用，体现“文官执笔”的传统。后因礼仪演变为无墨纯装饰的“白笔”。

毛笔通常与紫色包裹笏板搭配使用，同为古代官员的办公用品。

“笏板”最主要的用途，是中国古代大臣朝见天子时，用来记录天子的命令或旨意，也可用来书写向天子奏的章疏内容，为备忘提示用。如《释名》：“笏，忽也，备忘忘也。”及《礼记·玉藻》：“凡有指画于君前，用笏；造受命于君前，则书于笏。”据说，笏板还有另外的作用，就是挡住自己的脸，用以彰显龙威，上朝面见天子眼睛要望着笏板，表示对天子的敬意。笏分别用玉、象牙或竹制成，官位高低决定不同材质的笏板，笏板也是仕途成就的象征。

归有光的《项脊轩志》记载：“顷之，持一象笏至，曰：‘此吾祖太常公宣德间执此以朝，他日汝当用之！’祖母以祖传象笏激励后代。”

毛笔和笏板作为封建社会官员身份的标识，一直沿袭至清朝才废止。

父亲有一个玉石笔筒，平时毛笔钢笔都插在里面，不许任何人动。我练毛笔字，也只能“望筒兴叹”。我取竹竿，取羊毛，自制过几支毛笔，但都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没过多久，头就掉了。取兔毛重新制作，兔毛细致，用开水一烫，能扎紧，用好长时间。父亲说：“不要小看一支小毛笔，需要经过选料、水盆、干作、零活、刻字、包装等6道大工序；洗、浸、拔、并、梳、连等50多道工序才能完成。”

此刻，我的目光透过书桌上的笔筒和砚台时，犹如另一个世界的雨滴，落到不知名的地方。

文化看台

梅花秦韵 湖城绽放

7月25日，由宁夏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政府主办、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局广电局承办的“梨园秦韵 金凤有戏”2025年秦腔票友大赛，在银川市金凤区满春园文化广场举办。



第十五届中俄文化大集开幕

7月26日，第十五届中俄文化大集在黑龙江省黑河市中俄文化艺术中心开幕。本届中俄文化大集包括高端互访、文化交流、文旅推介、沿边文旅走廊建设四大板块，共40多项活动，致力于深度激活沿边文旅资源，为中俄文化交流与区域合作注入全新活力。



第三十三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在渝开幕

7月25日，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主办、重庆市人民政府承办的第三十三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在重庆开幕，线上线下汇集精品图书上百万种，其中新书约10万种。(新华社发)

短讯

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南梁革命根据地核心展示园开园

8月1日，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南梁革命根据地核心展示园落成开园。该园是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甘肃段核心项目，通过现代科技手段和互动体验设计，让红色历史“活”起来。

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南梁革命根据地核心展示园地处甘肃省华池县南梁镇。该园占地逾315亩，园内开设“时光邮局”“南梁星火馆”等体验项目，融合呈现了南梁传统文化与红色革命文化。

《诗韵中华》音乐会在港上演

《诗韵中华》音乐会8月2日在香港文化中心音乐厅举行，作为香港“中华文化节2025”系列活动之一，呈献《但愿人长久》《阳关三叠》等诗乐作品。现场既有20世纪经典乐章，也有香港本地作曲家受古典诗词启发创作的当代作品，包括麦家乐作曲、取材自白居易名篇的《长恨歌》选曲等。(新华社电)